

原住民文學中 原鄉題材創作的發聲座標

原住民文學の「原鄉テーマ」創作についての発言の座標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meland Themes” in Creative Writing of Aboriginal Literature

文 | 余友良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原鄉字面上直觀的說法通常解釋為「原來的家鄉」。相對於現在的家鄉，「原來的」一詞不僅暗示著「原鄉」在時間上的今昔對比或是空間中的景物已非，更有著從「現在的」定居家園去追索「原來的」已失落家鄉的憧憬想像。因此當創作者使用文字召喚失落時空的同時，我們可以從文學原鄉圖像與真實原鄉世界之間的罅隙，觀察到原鄉創作題材中，作者自覺或不自知的心理運作機制。



原住民文學中的原鄉寄託，常常同時具有樂園與烏托邦的雙重特性。(圖片提供：余友良)

書寫原鄉 具內外雙重意義

「書寫原鄉」對於當代台灣原住民族而言，可能同時具有內在與外部的雙重意義；所謂內在意義，是指涉著文學創作中普遍存在一種人類對原鄉故土乃至於美好時空的嚮往追求，其中除了呈現出難以切割的歸屬感與童年經驗之外，相對於平地人的原鄉書寫，原住民族則更充滿了對自然山海的依戀以及起源傳說

的獨特性。

另一方面，外部意義則牽涉到原住民族在台灣社會的處境問題，原住民原鄉空間在都市化與「漢」文化主流的雙重壓迫下，逐步衰頹並走向邊陲，這使得原本扎根在原鄉生活中的民族文化，失去了傳衍的生命力與舞台，因此，許多原住民創作者有意識地依靠書寫去重現原鄉、甚至重返原鄉生活，其目的就是在於



以達悟族文化價值為核心，夏曼·藍波安某種程度上摒棄了現代化的物質價值，而以傳統知識與身體勞動展現著近乎小國寡民的理想。（圖片提供：杜侃倫）

使民族的文化語言不致僵滯消失，更進而能藉著原鄉中的生活實踐，維繫文化傳承、凝聚起民族認同。

民族危機 促成書寫動力

在原住民文學的原鄉形象研究中，我們往往可以發現裡頭充滿了一種美好時空原型的營造。但不同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樂園追尋、也並非西方哲學裡理想政治的烏托邦想像，原住民創作者著眼於歷史、文化、情感失落之後的理想原鄉時空追尋，促成書寫原鄉主要的動力，實是源於民族強烈的文化危機乃至生存危機。

然而，原住民文學中的原鄉寄託，卻是常常同時具有樂園與烏托邦的雙重特性：同時既指向了復古時空的美好追尋、也在流動想像中

建構著對民族未來的美好圖像。原住民創作者有意識地以原鄉做為書寫對象，既在某種程度上提供著現實壓迫的逃脫、又在原鄉文化的重構上，展現其強烈反壓迫的企圖。

因此，就個人而言，原鄉是對內匯聚成長經驗的空間，其中難以切割的情感必然是主體認同（identity）的源頭，透過回望原鄉，創作者得以重塑記憶、追索歸屬感的依附與自我存在的意義；另外一方面，原鄉也是原住民傳統文化的最後據點，從原鄉所樹立的文化價值出發，對原住民族而言，除了是凝聚認同的有效路徑之外，更能藉由強化原「漢」書寫立場的差異，確立民族對外發聲的座標，進而形塑出抵抗主流文化的自主空間。



原住民文學中的原鄉形象，不同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樂園追尋、也並非西方哲學裡理想政治的烏托邦想像；創作者著眼於歷史、文化、情感失落之後的理想原鄉時空追尋，實是源於民族強烈的文化危機乃至生存危機。

原鄉部落 創作實踐的起點與終點

因此，原住民原鄉書寫的出發點，既是在對文化、歷史記憶散失的重新追尋，也是對民族乖離命運的反動；可以是個人意志的溯源，更可能是集體意識的召喚。在瓦歷斯·諾幹早期的論述之中，便已注意到原鄉部落所具有的深刻內涵，他在《番刀出鞘》一書中寫道：「我咸信原住民族群的傳承，每一座部落是實踐場域的原點，而實踐的過程容或在媒體、在街頭、乃至於在議會，終點還是會回到最初的部落裡，失去了部落，原住民族群相對地亦失去了抗爭的場域，抗爭的終極關懷。」



原鄉是宣示主體性與民族關懷的場域。(圖片提供：杜侃倫)



獵人靠著吼聲與槍聲來驅趕迷途的不安，並確認自己的位置以召喚族人。原住民創作者從原鄉部落發聲，一方面靠著書寫深化民族經驗，藉以驅除遺忘祖先的恐懼，另一方面透過生長土地上的記憶扎根，找到能繼續前進的認同力量。

以原鄉做為書寫題材，他強調創作實踐的起點與終點都該是在原鄉部落，換句話說，創作過程的動力來源與目標方向也都是指向著原鄉。原鄉能夠提供著個人以家/群體感/認同空間的撫慰，就動力來源而言，是所有原住民創作者在作品中永恆的精神寄託；另外，就目標方向來說，原住民創作者的終極關懷也都是投向著原鄉，於是在作品中重新凝視原鄉土地上的族群生命經驗，記錄原鄉的文化生命力，能夠使得步入黃昏的民族命運得以藉書寫維繫著一線光明。

原鄉 情感寄託的認同空間

以原鄉做為書寫對象，對創作者與對民族整體而言都有著不同層面的意義。回望原鄉，可以突顯出現實中個人的情感寄託，例如瓦歷斯·諾幹的〈在大同〉：

進入社會，我不再捧書朗讀
被賣斷的青春課本從不解答
在華西街陰冷的房間一角
偶爾，我還會想起故鄉
賭博醉酒的母親，死於
斷崖的父親，荒廢的田園
和尚在讀書的弟妹

瓦歷斯·諾幹筆下的雛妓，在絕望的現實中生活，回想那個早已荒蕪的故鄉、殘破的家庭，卻仍能提供著她一絲的情感安慰。另外，同樣是娼妓的悲情宿命，在莫那能的著名詩作〈鐘聲響起時〉裡，原鄉也具有美好時空的投射，部落學校與教堂裡的鐘聲，成為現實中救贖的象徵：

當老鴇打開營業燈吆喝的時候
我彷彿就聽見教堂的鐘聲

又在禮拜天的早上響起
純潔的陽光從北拉拉到南大武
灑滿了整個阿魯威部落

當客人發出滿足的呻吟後
我彷彿就聽見學校的鐘聲
又在全班一聲「謝謝老師」後響起
操場上的鞦韆跟翹翹板
馬上被我們的笑聲占滿

……

再敲一次鐘吧，牧師
用您的禱告贖回失去童貞的靈魂
再敲一次鐘吧，老師
將笑聲釋放到自由的操場

一樣是描繪淪落風塵的原住民少女，無論原鄉的記憶是美好或是破敗，對家的眷戀與情感寄託，始終是人們現實缺憾的最終出口，一如個體在省思自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時，必須尋覓一處足以說服自我並獲取認同的天地（邱珮萱，《戰後台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3，未出版，頁169）。做為情感寄託的認同空間，原鄉能夠提供純粹的心靈安頓，這樣指向樂園意義的原鄉想像，是每個人心靈版圖中都存在一塊已逝卻永恆的精神家園。

原鄉 宣示主體性與民族關懷的場域

除此之外，於群體上來說，原鄉也是宣示主體性與民族關懷的場域，書寫原鄉也是意圖重新建構出民族自主的文化空間，特別是在夏曼·藍波安的作品《航海家的臉》中可以清晰見到：「孩子們的母親理解，如此的勞動在達悟社會裡內在的文化意含，體會族人，原初的無須動大腦的體能勞動耗在從事低級生產的土地上的樂趣……，在這個層次上，所有部落民族文化解釋的源頭或者說是，不斷重複勞動的能量，不斷的體驗大自然作為勞動生產的對象時，累積的在地經驗知識，延伸到精神層次的



余友良

1979年出生成長於新北市樹林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即以原住民文學中的「原鄉書寫」為探討範圍。畢業後於山海文化雜誌社擔任企劃人員至今，規劃執行過多項原住民文學相關活動。

傳統宗教信仰的領域，是建立同質共時性的價值觀。」

以蘭嶼達悟族的文化價值為核心，夏曼·藍波安不僅深入母體文化之中，耙梳了民族在地經驗的知識體系，更透過身體力行的實踐，去體現祖先原初的理想生活方式。某種程度上摒棄了現代化的物質價值，而以傳統知識與身體勞動展現著近乎小國寡民的理想。回歸到自信與榮耀的原鄉價值之中，創作者劃出了原「漢」民族書寫的自我邊界，原鄉在他筆下所呈現出與文明現實之間的距離，才正是突顯了其中寄寓理想的烏托邦原鄉特性。

不論是個人式的樂園或是群體意義的烏托邦，原鄉圖像在原住民文學中的不斷地出現，都象徵著原住民族一次次確認主體位置的發聲，一如霍斯陸曼·伐伐一段近乎寓言式的文字：「小時候，父親告訴我：『在迷霧中迷失的獵人，都會不斷的發出吼聲和槍聲，藉以驅趕內心的懼怕及讓前來尋找的族人知道自已的位置。』當時我覺得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迷失實在是不可思議！」

獵人靠著吼聲與槍聲來驅趕迷途的不安、並確認自己的位置以召喚族人，而原住民創作者從原鄉部落發聲，一方面靠著書寫，使民族經驗得以深化，藉以驅除遺忘祖先的恐懼，另一方面，更使得在迷霧之中迷失的族群認同，得以透過生長土地上的記憶扎根，尋找到能繼續前進的力量。◆